

香港唐樓：一部鑄刻在磚瓦間的城市記憶史

梅毅

一部建築史，半部香港魂。在香港鱗次櫛比的摩天樓群間，低矮的唐樓如同歷史的錨點，牢牢繫住這座城市的記憶。這些沒有電梯的老樓，既是市井生活的容器，也是嶺南建築西漸的活化石，更是香港從漁村蛻變為國際都會的沉默見證者，它們以青磚、混凝土和人間煙火，書寫了一部跨越百年的建築傳奇。

「唐樓」之名源於「唐人」之意，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香港最普遍的民宅形式。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它被稱為「店屋」；在廣州，它化身為「騎樓」；而在香港，它則成為華人移居的生存空間和嶺南文化的特殊載體，反映了香港作為中西文化熔爐的特性。十九世紀中後期，隨着香港開埠，港英政府將維港兩岸核心地段劃為「洋人專屬區」，同時引入配備電梯的西式「洋樓」；而華人則被驅趕至太平山街、上環等邊緣地帶，建造起外形如積木般的住宅，後被冠以「唐樓」，意即「中國式樓房」。「唐樓」這一命名本身，便是殖民語境下文化身份的被動定義。

早期唐樓多為兩至三層高，以青磚砌牆、杉木為樑，屋頂覆蓋中式瓦片，沿襲了華南傳統民居的「下舖上居」風格，底層商舖、上層住宅的商住混合模式是其標誌。在公共房屋尚未出現的年代，除寮屋居民外，幾乎所有港人都是唐樓的住戶。為適應香港密集的都市環境，香港唐樓進深拉長至九至十八米，寬僅四至五米，然而卻因其背靠背密集排列，導致通風採光較差，且無獨立廁所，陰暗室內依賴油燈照明，公共廚房僅憑小煙囪排煙。每戶可容納多達幾十名居民，甚至有居民在家中飼養家畜，衛生條件十分堪憂。如今僅存的中環威靈頓街120號「永和號」唐樓，成為這一代建築的孤本，其逼仄空間映射了早期華人社會的經濟困窘。

真正讓唐樓蛻變為香港標誌的，是一九〇三年《公共衛生及建築條例》的頒布，該條例引入英國建築標準，禁止新建「背對背」唐樓，要求樓宇間必須留出一呎寬的後巷，規定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一點六五平方米。更關鍵的是，為適應香港悶熱多雨的氣候，還引入八英尺寬柱廊作行人道，形成可遮陽避雨的「騎樓」通道。有趣的是，這種「騎樓」設計早於廣州二十餘年——一八八八年落成的灣仔「和昌大押」已具柱廊雛形，印證香港作為文化中轉站的角色。為改善通風，部分唐樓還增設通風天井設計，樓宇中空形成垂直風道，配合挑高天花板加速氣流循環，解決了早期「無窗房」的悶熱。例如灣仔「藍屋」建築群（一九二二年興建）的內部天井，既緩解了濕熱，也成為鄰里交流的「垂直院落」。

一九三〇年代鋼筋水泥普及後，混凝土取代了磚成為唐樓的主要建築材料。這時香港唐樓的建築風格也是百花齊放：新古典主義立柱、裝飾藝術幾何線條、中式灰塑匾額並存。一九三一年建成的九龍雷生春堂堪稱為典型代表：弧形立面、愛奧尼柱式與灰塑店名，兼具通風功能與中西美學價值，底層為涼茶舖與醫館，樓上住家，形成「西醫為體、中醫為用」的市井生態單元。此時期唐樓須由建築師設計，標誌其從民間自建轉向專業化營造。

二戰後，香港人口從戰時的六十萬飆升至一百五十萬。唐樓成為難民唯一的避難所，在擠壓中迸發出驚人的空間韌性。一套三百平方英尺（約二十八平方米）單位被精密分割為：臨窗主間、光線最佳的「騎樓房」、「中間房」、無窗僅容一床的「尾房」，廚房上方加建躡行方能入內的「閣仔」，甚至細分為按小時出租的鐵絲網「籠屋」床位。這種空間分割在深水埗等區域尤為普遍，成為香港草根生活的



▲雷生春位於香港九龍旺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界，是具古典意大利建築風格的唐樓。

真實寫照。包租婆制度也應運而生，業主將整棟租給包租者，後者再分租牟利，形成獨特的租賃生態鏈。「包租婆」提着煤油燈巡樓收租的剪影，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當室內空間飽和，居民向天空拓展。一九五〇年代，大量居民在親友所住的唐樓屋頂自建「天台屋」，復刻養雞種菜的鄉村生活。居民們晚間常到天台乘涼、聊天、賞月，使天台成為天然的社區中心。更有趣的是，一九六〇年代香港迎來武館「黃金時代」。因天台租金低廉，全港四百多家武館多設於此。每到黃昏時分，武館學徒在天台練習拳腳兵器或舞龍舞獅，鑼鼓聲此起彼伏，成為獨特的城市風景。

在香港人心中，唐樓不僅是居所，更承載着集體記憶與鄰里情誼。在唐樓的通廊、天井與樓梯間，居民們彼此熟悉，相互幫助，孕育出獨特的社區文化氛圍。唐樓樓梯轉角成為主婦交換菜價的「情報站」，主婦們在此分享潮州腌菜、上海菜飯，孩童在木樓梯追逐嬉鬧。王家衛《花樣年華》電影中，張曼玉端麵穿過騎樓長廊的鏡頭，正是這種「通廊式鄰里生

態」的詩化呈現。唐樓底層商舖如中環「公利竹蔗水」、上環「源吉林盒仔茶」，既是老字號經濟的載體，也是街坊社交節點。

總而言之，包租婆的市井精明、鄰里共用水喉的妥協藝術、天台乘涼的集體記憶，這些共同構成香港草根社會的精神底色。

隨着高樓時代來臨，唐樓在推土機下急速消失。據市區重建局統計，全港現存戰前唐樓不足兩百幢，不足一九七〇年代的百分之一；而二〇一五年灣仔同德押拆除後，全港更是僅存十一座轉角唐樓。但近年的保育運動，正為這些「石屎森林中的遺跡」注入新生。雷生春堂捐贈政府後成為中藥館；和昌大押變身酒吧；美國建築師戴爾·科斯洛翻新二十間唐樓公寓，堅持復原窗花、地磚等細節，讓「港漂」體驗原味唐樓生活；永利街則因電影《歲月神偷》喚起集體記憶，最終免於清拆，成為活態博物館。

從十九世紀的青磚瓦頂，到深水埗的板間房，唐樓承載的不僅是居住功能，更是一部香港平民的生活史詩，它用騎樓接續了嶺南雨巷的集體記憶，以板間房收容了動盪時代的離散人生，也見證了天台上的武術點數與鄰里笑談。當雷生春的藥香漫過百年露台，當藍屋的居民在連廊上互贈湯羹，這些矮小的唐樓依然以磚瓦為紙，寫下一座城市的生存哲學：歷史不在博物館，而在鄰里晨昏間的煙火溫度中。

七日談

（廣東篇）

不同的光芒

幫助塑造了英國的時尚、音樂和更廣泛的流行文化。

事實上，始於英國的新浪漫主義運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達到高峰，圍繞華麗和偏執的時尚以及新浪潮音樂，從倫敦迅速蔓延到英國其他大城市。在音樂領域，包括杜蘭、杜蘭、施潘道芭蕾舞、超聲波以及亞當和螞蟻等各種樂隊爭奇鬥艷，不僅打造了新浪漫主義藝術家的標誌，也成為眾所周知的時代縮影。

當然，新浪漫主義也招來嘲笑，比如外界質疑他們將流行音樂聚焦在更加瑣碎的事情上，以及風格有些劍走偏鋒，就像有意被培養成下一個喬治男孩的Blitz俱樂部男明星羅賓遜，不僅以連身裙、狐狸皮、鑽石、五英寸高跟鞋等女裝示人，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瑪麗蓮」來博人眼球。此外新浪漫主義者過度追求形象上的「突破」，例如喬治男孩，塑造了看似「畏懼」的外觀，配以拉斯塔帽子和濃艷的妝容；另一位「朋克之母」的女魔頭設計師薇薇安·韋斯特伍德，開創了歷史和現代相結合的「內衣外穿」等趨勢，這些做法都超出了大眾接受範疇。

儘管如此，伴隨新浪漫主義之風盛行，也不可避免地吹到藝術、文學、戲劇和電影甚至建築等廣泛的領域。在繪畫藝術方面，新浪漫主義作為先行者，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便已滲透到英國創意生活的關鍵領域。它獨特的主題和情緒很容易辨認：銀色新月照亮的夜間風景和城市景觀，被灌木叢覆蓋的破敗小屋，以及躲在陰暗林地和被

炸毀的街道中的焦慮人物等。這些圖像中瀰漫着一種懷舊、不祥和幽閉恐懼症的感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二次大戰和夜間停電使英國陷入多年黑暗所產生的焦慮來解釋。

此後隨着抽象表現主義、普普藝術和「新一代」畫家的崛起，城市的荒廢、田園牧歌和夜間的陰鬱似乎越來越過時，在很多人眼中，新浪漫主義的懷舊情緒過時了保質期。一旦遮光窗簾被拉開，陰暗色調被打破，英國新浪漫主義畫家紛紛開始尋找新題材，其色調變得越來越明亮。比如，格雷厄姆·薩瑟蘭前往明媚的法國南部；克拉克·斯頓和艾爾頓被希臘的陽光、大海和神話所吸引；約翰·明頓創作了一些非凡的書籍插圖，描繪了多彩的科西嘉島懸崖面、街道和仙人掌，而基思·沃恩則將注意力從深褐色的風景，轉向沐浴在陽光下的沐浴者。

如今，新浪漫主義留下的更多是時代記憶，人們也許只能在鄉村主義者的夢幻畫作中、在基特·博伊德的款語致敬中、在諾曼·阿克羅伊德的凹版畫陰影下，以及在馬克·赫爾德的月光貓頭鷹版畫裏才能找到對新浪漫主義的呼應。

值得一提的是，倫敦設計博物館從今年至明年，將用兩年時間舉辦以Blitz俱樂部為代表的新浪漫主義展覽，帶領觀眾重新領略上世紀八十年代色彩鮮明的個人主義。正如英國作家迪倫·瓊斯在《甜蜜的夢》一書中所說，新浪漫主義色彩繽紛又花哨的世界最終褪成了灰色，可至少有一段時間，他們實現了最甜蜜的夢想。



向日葵花海引客來

近日，北京景山公園內一片約兩千平方米的向日葵主題花海綻放，與遠處古建築相映成趣，吸引眾多遊客前來觀賞。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英倫漫話

江恆

位於考文特花園的破舊酒吧，那裏每天接待大批藝術家、朋克和搖滾迷，他們化着濃妝，打扮成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荷里活吸血鬼、海盜等等，熱鬧非凡。這激起了傑格的極大興趣，他向俱樂部提出想與對方簽約演出。但俱樂部的主持人、青年歌手史蒂夫·斯特蘭奇拒絕了他，理由是這裏只接納「有創意的先鋒」，這位滾石樂團的主唱不符合標準。傑格感到十分疑惑，斯特蘭奇作為一個剛搬到倫敦的小鎮青年，是如何成為酷與不酷仲裁者的。

他的不解自有道理，Blitz俱樂部作為大衛·鮑伊、喬治男孩等音樂名人經常光顧的地方，滾石樂團完全有資格成為其中的一員。果不其然，四年後當喬治男孩出現在《滾石》雜誌的封面上時，滾石樂團對美歐的影響已與披頭四樂隊相提並論了。很快，受到Blitz俱樂部那些流行搖滾、先鋒電子樂和條頓迪斯科等風格影響的音樂，迅速佔領了英國和美國的排行榜。在此風潮之下，Blitz俱樂部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新浪漫主義運動（New Romanticism）的重要中心，

從議員助理做起（上）

前不久在青聯的活動上，我認識了凱蒂。她坐在我隔壁，我們兩個性格外向的人，自然而然地聊起天。

我問她，喜歡做義工和在金融機構工作並不衝突，為何要徹底轉行。她笑着說，金融圈不缺一個我，但社會工作更缺人吧。我本來就喜歡做義工，索性考慮做議員吧。如果專心做，做到有影響力，就有更多資源幫到社區有需要的人。剛好機緣巧合看到這位區議員招助理，該議員在社區的口碑很好，也做過不少實事，為人低調謙虛，是我願意跟隨的人，就果斷應聘了。

在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中，有名有利，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對年輕人而言，或許無可厚非。可凱蒂的珍貴初心，卻是稀缺資源。我追問她轉行後的心路歷程。有無片刻的後悔，有無挫折，有無新的認知。很顯然，我的擔憂是多餘的。她自始至終都很熱愛這工作，雖然和所有的工作一樣，也有惱人的人際關係需要應對；雖然像任何職業都會面對「刁鑽」客戶的可能，她也會遇到「暴躁和難以溝通」的基層人士；雖然在法例面前有人違規要付出代價，但那些無心之過犯錯的基層人士，仍需要幫助。



暄暖人生

香寧

她二十來歲，樣貌甜美，笑容燦爛。在美國讀完高中、加拿大大學畢業後她回到了香港工作。當她告訴我現在是一名區議員助理時，我頗感驚訝。香港一直以來是個商本位的社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雖說香港一直以「高薪養廉」的政府公務員團隊著稱，可在我認識的年輕人中，像她這樣家境寬裕、海外高等學府畢業的年輕人，回到香港後，大都在金融機構或者上市企業任職。

交談下來，原來這不是凱蒂的第一份工作。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投行，工作出色，順風順水。

可是兩年後的某天，她看到了一則議員助理的招聘廣告，那則廣告讓她想起從大學開始至今的義工經歷。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歡和公眾接觸，她性格樂觀外向，是個充滿能量的給予者。大學時她為罹患癌症的兒童籌款。回到香港工作後，她也沒停過義工活動：參與過環保活動，為有需要的人士準備物資；她去過健康流動站做義工；到



黛西札記

李夢

由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先生擔任策展人的「書寫的力量」群展，上周五至本周四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筆者到訪時，正是炎炎午後，室外潮熱難耐，甫入展場，流連書畫作品間，未幾已覺周身爽涼，足見藝術的力量，熨帖、慰藉，讓人心安。

今次展覽是香港第二屆「中華文化節」重點活動之一，匯集六十位來自不同職業和學術文化背景的名人專家，展出其以「書寫」為主題的作品，既有書法、油畫和水墨畫作，也有數碼錄影和裝置作品，豐富多元。展覽尤具特色之處，在於並未固限「書寫」的載體和用具。參展藝術家可以用筆墨、水彩甚至燈光，寫在紙面、畫布、街道招牌或瓷器上，顯示不同情景與樣態的書寫如何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裏，並模塑香港這座中西交融城市的獨特景觀。

書寫之美



▲觀者欣賞「書寫的力量」群展中林天行的巨幅書法作品《宅茲中國》。

作者攝

參展藝術家背景各異，既有多年從事傳統書畫藝術的名家，也有藝文評論家、詩人、醫生和企業家等等。借用策展人林天行的話，他們雖來自不同領域，卻「均是通過書寫而得到快樂、得到力量」。從筆畫到線條，從雕塑到數碼，書寫的方法與形態固然隨時代更迭流轉，但其間的精神與審美，跨越山海，穿行時日，依舊栩栩如新。

古人云：以文載道，以書明道。「書寫」本身及其展陳的成果，向來為君子喜。古人的學識修養、情思心意，皆在筆端，在紙面流淌，並綿延至今。今時今日，我們在互聯網語境下談論「書寫」，情景和語義皆更擴拓多變。今次展覽中，當毫筆之齡的著名學者金耀基先生的書法作品，與一眾「八〇後」和「九〇後」青年藝術創作者的多媒體作品並置於同一空間，其間生出的張力頗耐人琢磨。今時今日我們談論的書寫，早已跳脫紙與筆的慣常語境，而更包容、更具創意，且富有生命力，與我們生活的城市、與我們朝夕相處的時代景況愈加契合。

在筆者看來，是次「書寫的力量」群展，其魅力在於「以小見大」，從一滴墨、一筆畫的細處，放大開來，至無窮廣的外延，看文字、語言和藝術的恆久魅力。在人人皆可AI的當下和未來，「書寫」的精神內裏，其對於人類情感的抒發和慰藉，對於文化和文明的傳承和交流，尤其值得我們深研與細味。